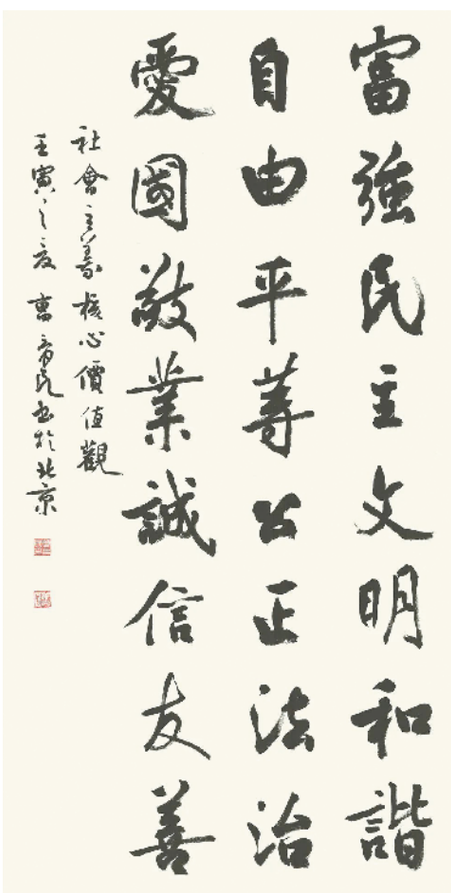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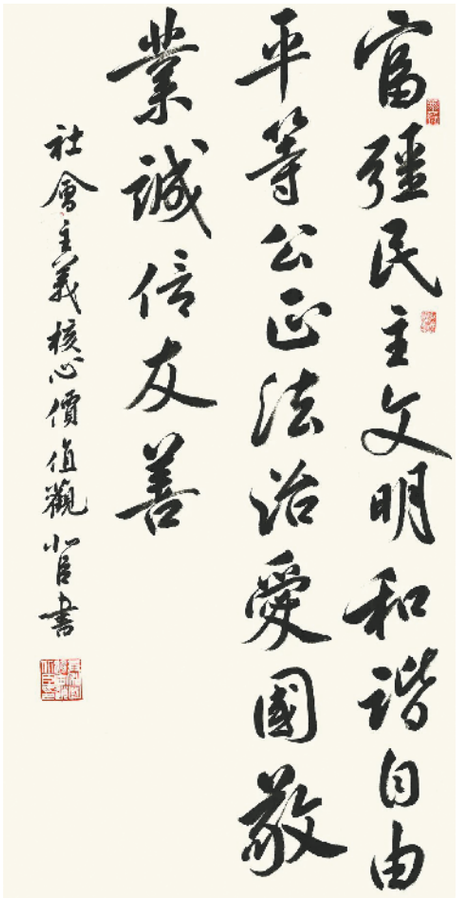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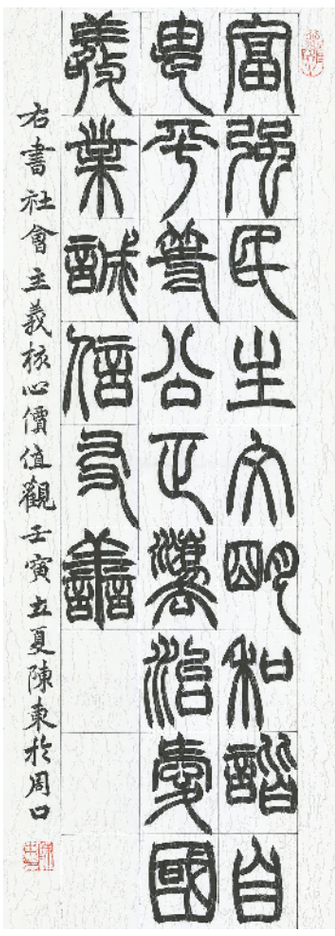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暨“道德名城”名家书法作品展



曹育民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军委办公厅原副主任



赵北臣 武警部队原政治部副主任、少将警衔，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陈东 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时代的记忆 纯真的散文

——浅议郭志刚的乡情散文

张恩岭

在当今文坛和大众阅读中，散文是颇受欢迎的一种文体，因为散文创作是一种侧重于表达内心体验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学样式。它偏重于对客观的社会生活或自然图景的再现，又主要以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真情实感打动读者。

在郭志刚近年来发表的多篇乡情散文中就体现了散文的这一本质特征。乡情散文是基于作者在故乡的一段记忆，乡情是一个人生命中在故乡的经历，它不是印在故乡的大地上，它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郭志刚的散文，就在不断的写作中，在散文的文学美质上达到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令人倍感亲切的可喜境界。

时代的记忆

散文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强调真实，追求避虚就实的真境界，不允许夸张和虚构，常给人一种如闻其声、如临其境的美感。郭志刚的散文给我最强烈的印象就是真实。他所记叙的人物和场景大都是改革开放前几十年间豫东农村生活的真实场景。这诸多场景，随着现代化的飞速发展，已经成了时代的记忆。他所叙述的故事，无论对于我们的历史记忆或情感记忆，都是有巨大价值的。因为他所记述的生活和情感，可以说是我们上几代人的生活之根、生命之根、情感之根。我们现在的一切，都是在那个根上生长、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不能忘了我们的根，也就是说不能忘本。

郭志刚的乡情散文，主要有《乡村的老井》《过年》《麦收》《清明时节》《走亲戚》《一副银镯子》《推不完的磨》《最忆是春天》等。在这些文章中，当年农村的景象清晰可见：“那时一个村子中只有一眼井，全村人都靠这眼井去生活。一到晌午，各家各户都去打水，身强力壮的汉子用扁担挑着两个大水桶。那时的水桶是用木做的，中间用铁圈箍着……后来，村里出现了压井，老井一天天受到人们的冷落，大学毕业后竟发现老井不知什么时候被人们填平了。”(《乡村的老井》)

读了这段话，不禁令人唏嘘。是啊，水是人们的生命之源。但现在人们喝的已大都是自来水、纯净水了。恐怕四十岁以下的人就很少看到过这种养育了我们祖祖辈辈多少代人的生命之井了。郭志刚的这篇散文，给我们留了时代的记忆，也留下了永存心底的、亲切的感恩情怀。

在《麦收》一文中，作者写道：“天还没亮，麦田里的人影绰绰，人们弯着腰，一个撵着一个地挥舞着镰刀，谁也顾不上说话。当太阳在东方地平线上露出晚起的红脸，老人和孩子们提篮端罐地往田间地头送来早饭时，麦地里一捆捆的麦个子已顺着麦垄排成长长的队伍了。”

作者在文章中还写了“造场”“打场”“垛垛”的情况，都很原始，也是现在的人们再也见不到的场景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那庞大的收割机，瞬间把活泼的金色的原野化成光秃秃的土地，把那金灿灿的麦穗瞬间变成没有活力的麦粒。但是，那些留给我们无限温馨的真实记忆，已经被作者留在了纸上。

散文就是这样，没有多少复杂的技巧需要掌握。散文常常强调真实，虚假是散文的大敌。散文的特征就是做艺术真实更接近生活的真实。郭志刚的散文，正是直率地没有修饰地流露出这种自由的、真实而又真挚的美感。

深沉的真情

散文天生就是抒情的，在文学艺术“抒情”的赛场上，情之最真、最痴、最自然者莫过于散文之情。但，散文创作是一种侧重于表达内心体验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学样式。它对于客观的社会生活或自然图景的再现，也往往反射或融合于对主观情感的表现上，它主要是以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真情实感打动读者的。这一点，在郭志刚的乡情散文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作者在《一副银镯子》中写道：在改革开放前的贫穷岁月里，一副银镯子是女人最心爱最珍贵的饰物。“过去娶媳妇时，男方家即使再贫穷，也要想方设法打上一副银镯子作为聘礼送给女方。”可本文作者的父亲在迎娶他母亲时，家里就偏偏打不起这副银镯子。正在他爷爷为此事发愁的时候，他的已过门几年的伯母却取下自己的银镯子，送给父亲，作了父亲送给母亲的聘礼。于是，这副镯子就成了母亲一生中最值钱最珍贵的首饰。但作者长大以后，却亲眼看到母亲把这一副镯子郑重地送还已经病重的伯母时的场景，因为母亲早已知道了这副镯子的来历，也早已记下了伯母的深情。作者写道：“母亲说，大嫂，我把镯子还给您吧！说着就去摘手腕上的镯子。这时十分虚弱的大娘不知哪来的劲，一把抓住我母亲的手，声音很小，但却坚决地说，他三嫂你戴好。戴好，别摘……两个老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眼睛里盈满了泪花。”

当我读到这一段文字时，竟然流下了热泪。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情景，更是那个时代的人间真情。今天，当人们在下聘礼时议论着“三金”需要多少克才显得体面时，我们才真切感到清贫时代，那种纯朴真挚的人间真情多么可贵！

如此纯朴、自然的，却满含深情的文字，在郭志刚的散文中随处皆是。他在《过年》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似乎只是一幅热闹的场面而已，过年时，“孩子们最盼望的还是熬肉，平时人们一年到头难得吃上几回肉，这个时候就可以大快朵颐，你看孩子们啃骨头的那个样子，那真就叫馋叫香，这是人们童年记忆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作者的抒情就在这朴实的叙述中，对童年时代那种单纯而又满足的幸福感、快乐感，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我们今天的生活中还有这种体会和感受吗？没有了。当然，“没有了”也是一种社会的发展。但这种过往年代那种童年虽然心酸却也单纯快乐的情感就这样记录在作者的散文中，也留在了历史的时光中，更留在了我们情感的深处，慰藉着我们的心灵。

朴实优美的语言

散文的写作也讲技巧，没有技巧的文学作品是不存在的，但在散文中，所有艺术技巧运用的成败，无不决定于运用语言的优劣。散文是人的灵魂同语言的完美合作。而对散文语言的要求，就是如何运用自然流畅、形象生动而又优美的语言来完成散文的创作。

首先，散文的语言讲究华丽而不做作、朴实而不贫乏。尤其是一些记人叙事的散文语言，一般都采用朴质无华、通俗易懂而不失优美的语言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这种语言必须具有洁净、流畅并且蕴藏着感情浓度和思想力度的美质。对于这一要求，在郭志刚的《清明时节》《最忆是春天》等文章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还很贫穷，不像现在到处都是花。只是谁家院里种了桃树、梨树或杏树，才能看到少许的花，正因为少，才显得弥足珍贵，惹得全村人都来观看。我小时候印象最深，感觉最美的是我大爷家的大榕树。春天来了，榕树开出粉红色毛茸茸的花，形状像梳子，十分漂亮。记得我们村东头泥河岸边有一个桃园。满园的花儿最是好看，但看园的人不让我们靠近，只能远远地望，好在油菜花开了，我们可以在油菜花地里尽情地游玩。那金黄的油菜花香气扑鼻。还有蜜蜂，蝴蝶飞来飞去，真是美不胜收。当然，对于孩子们来说，最喜欢的还是桐树花，不光因为喇叭状的桐树花好看，最主要的是桐树花可以做成有趣的玩具。”(《最忆是春天》)

这一段文字读来让人眼前一亮，可真是一个朴实鲜明、五彩缤纷的世界，它的活力和新鲜让你心旷神怡，似乎一股花香沁人心脾。如果没有这样一段童真的叙述和色彩明确的语言描绘，那么，这篇散文可能就失去了清纯而又活泼的神采。

同时，散文的语言还要求节律优美，这对于散文是非常重要的，有人说，散文的语言应如“珠落玉盘”，流转自如，富有韵律节奏、和谐优美，读起来朗朗上口。诗一样的语言如小桥流水，起伏跳荡，有一种无形的节奏韵律，给读者以行云流水般的美妙感受。

郭志刚在《清明时节》一文中写道：“清明时节，气温转暖，阳光明媚，草木萌动，百花盛开，气清景明，万物欣欣向荣，自然界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是人间最美好的时候。‘人间最美四月天，春城无处不飞花。’‘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春意盎然，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是这个时节最好的写照。”

我非常喜欢这一段优美的文字，有着一种诗词的节奏美，同时，作者又巧妙自然地引用了一些描写春天的古诗词，恰到好处，给文章增色不少。

辞章之美是散文审美的重要因素。郭志刚的散文以纯朴、真挚见长，同时，优美精彩的语言和段落时而散落其间，闪烁出令人动情的魅力。

总之，散文是我们阅读和写作中常见的一种文体。她具有鼓舞、教育和审美作用，可以慰藉我们的民族精神，陶冶民族情感，是我们自我保存、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精神动力与源泉。我真诚地希望类似郭志刚乡情散文的作品能更多地出现，这是一种对历史记忆的抢救，也能更好地发挥其在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作用。

简论柳岸『春秋名姝』系列小说的叙事策略

张世琪

作为在中国文坛上有着重大影响的中原作家群体——河南作家，他们始终对历史题材情有独钟，并且取得了非凡成就。自2016年7月起，作家出版社陆续推出周口作家柳岸的“春秋名姝”系列小说。所谓“春秋名姝”，即《公子桃花》《夏姬传》《文姜传》和《西施传》四部长篇历史题材小说的统称。众所周知，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遭到严重削弱，进而各诸侯国纷争不断，战乱四起，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变幻莫测。在这样的社会里，以公子桃花、夏姬、文姜和西施四大名姝为代表的女性，因为容颜貌美、性情善良，而不得不成为各国统治者筹谋政治的棋子。从个体的视角看，她们几乎都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的情感历史，但是从诸侯国的视角看，她们却常常能以聪慧的气质，为其诸侯国政权的稳定作出积极贡献。“姝”，源于《诗经》中的“静女其姝”。“名姝”，就是著名的美女，“春秋名姝”就是春秋时期的著名美女。“春秋名姝”系列小说，就是春秋时期四大美女公子桃花、夏姬、文姜和西施的个体传奇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春秋争霸史。

一、作为个体的历史叙述

历史传记小说大多以男性为主，多为帝王、诸侯、名臣等，如《康熙大帝》和《曾国藩》。“春秋名姝”系列小说则将叙述重心放在了几位女性身上，从而起到了不一样的叙述效果。

“春秋名姝”系列小说分别书写公子桃花、夏姬、文姜和西施四位女性的传奇一生，如果仅从题目上看，毋宁说小说写的就是四位女性的传奇史。仔细考察这几位女性，我们不难发现她们都有着绝美的容颜，这也就注定了她们生命历程的不平凡性。从公子桃花到夏姬再到文姜，三位女子因美貌辗转于多位男性之间。公子桃花最先是息侯的夫人，后因楚文王挂念，又成了楚文王后。夏姬更是如此，她曾有三任丈夫，并侍一君二臣。文姜的感情有些尴尬，她在成为鲁桓公夫人后，又与其兄长齐襄公私通。如果不是容颜惊人，她们的人生可能不会如此跌宕起伏。再看西施，她本身就是越王勾践“美人计”中的关键人物。如果西施的外貌不够出众，她怎么能担当起如此重要的任务？在绝美的容颜之外，她们还有特殊的身份。在这四位名姝里，有三位是诸侯国国君的女儿(公子桃花、夏姬、文姜)，有三位是国君夫人(公子桃花、文姜、西施)，还有三位是国君之母(公子桃花、夏姬、文姜)。而最为关键的，她们无一例外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关联。文姜出生于齐国，她不仅经历了春秋三小霸的争斗过程，还深深地陷入各诸侯国的纷争之中。公子桃花出生于陈国，却辗转于陈、息、楚三国，不仅见证了息国的灭亡，而且见证了楚国由盛到衰，以及晋国称霸的历史。夏姬出生于郑国，此时的社会环境更为复杂，她的一生经历了郑乱、陈灭、吴兴、楚衰，以及晋霸等政治事件。西施出生于越国，是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争霸事件的直接参与者。

当然，在四位“春秋名姝”之外，作者也涉及春秋各诸侯国的君主和臣子。譬如，在《公子桃花》中，出现的诸侯国有十一个，诸侯国国君多达二十七位。由此也带来了关于诸侯国之间的斗争史，如《公子桃花》里的重耳流亡、城濮之战，《夏姬传》里的楚庄王灭陈、称霸中原，《西施传》里近四十章节的吴越争霸，等等。甚至各国的臣子如越国的范蠡、陈国的孔宁和仪行父，作者也给予了较多的笔墨。但总体而言，他们的出场在更多的意义上还是居于衬托的作用。

作者从女性个体而不是君臣的视角重写历史，就表明了她对于历史的崭新理解。考虑到四位女性分别出生在春秋时代前中后时期，又因为她们与当时的君主、大臣都有交集，而生活在春秋政治的漩涡之中，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四位传奇女，一部春秋史”，并不为过。

二、“春秋名姝”的别样叙述

关于“春秋名姝”，柳岸曾这样说：“我只想以史料为骨骼，以文学为血肉，丰满复活这个人物而已。”柳岸对于公子桃花等女性进行了重新理解，如果说在以前的历史叙述中，这些人物已被打上某种固化的印记，那么，在这个系列的小说里，她们的形象则因为作者对于历史的崭新理解而发生了变化。

《夏姬传》中的夏姬就是这样例子。在既有的历史叙述中，夏姬被描述为妖姬，被骂作是淫荡不堪的女子，更是被批判为“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的罪人。柳岸并非不知道既有的夏姬叙事，但是她没有按照既有的模型叙述夏姬，而是在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赋予夏姬以新的认知。在小说中，夏姬是一个率真聪慧、向往爱情，却又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女子。少女时期的夏姬曾与兄长偷偷跑出王宫，去体验郑国的春浴节风俗，从河边溪水的玩闹，以及她被救时的羞涩，足以看出其天真烂漫的少女性格。由于郑、陈两国意图政治联姻以敌强楚，夏姬便被作为一颗棋子嫁于陈国司马夏御叔，但是她没有想到，她的公爹子夏会认为自己的美貌是不祥之兆。夏姬不仅没有心怀恨意，反而越发恭敬，不仅努力学习陈国礼仪，还劝说夏御叔纳妾，最后取得了子夏的认可。可以看到，出身尊贵的夏姬并没有刁蛮的性子，她在陈国识大体、顾大局，是其聪慧的表现。

《文姜传》中的文姜同样如此。据文献记载，文姜因与兄长乱伦而备受后人批判，刘向曾将其列入《列女传》中的《孽嬖传》。柳岸走访临淄和曲阜的文化研究人员时，他们也不太愿意提起文姜这个人物。然而，在《文姜传》中，作者却将其看作是春秋时代的传奇女子，她不仅经历传奇，还有着出色的政治才能。在大臣们为纪、夷两国事件争执不下时，文姜提出了巧妙的策略，齐僖公以此不仅保全了齐国，而且巧妙地处理了齐国与夷国之间的尴尬之境。虽然齐国最终没有完成对纪国的复仇，但将国家安全置于仇恨之上，无疑是文姜雄才大略式的才能展现。

胡平认为：“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又需要不断回溯历史，以现世的目光反省人类自身的文明与演进。”同样，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观念里，作者摈弃了既有成见，带着“每个时代的人们，遵从着不同价值观的制约，对两性关系做出不尽相同的评价”的希望，重新书写了作为历史女性的“春秋名姝”。

三、“春秋名姝”的选择叙述

春秋社会包罗万象，不仅有很多传奇故事，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大发展的聚集地。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时代，如果不对历史材料进行有效的选择，那么小说就会成为塞满史料的文献记载，而无法成为具有故事情节的小说。在创作“春秋名姝”系列小说之前，柳岸不仅竭尽全力去了解其历史背景，而且在网上查阅大量资料，尤其是在创作《公子桃花》时，柳岸曾经花费三年时间去研读春秋历史，可见柳岸对史料的重视程度。可贵的是，柳岸在创作小说时，并没有将全部史料纳入其中，而是对其进行了有效的辨认和挑选。譬如，关于夏姬，西汉刘向《列女传》载：“三为王后，七为夫人”。柳岸对此提出质疑。又如，春秋时期，除了楚国和后期的吴国、越国的国君称王之外，其他诸侯国的国君均没有称王，等等。柳岸没有沿用此类说法。值得注意的是，柳岸不只是对历史文献进行选择，而且有意识地将文献进行了嫁接。如《西施传》里“西子宫”的建造。现今，在诸暨市区南侧浣纱江畔有一座西施殿，据历史考察，在唐代时，诸暨苎萝山上就出现了浣纱庙。浣纱庙是纪念西施的寺庙，其最早记载的文字见于唐代诗人的诗句中。而在小说里，作者以“西子宫”代之，指出这是越王勾践灭吴之后，为纪念西施而为之建造的。作者如此处理材料的做法显然是为了凸显西施之于越国的贡献。

当然，小说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文献的选择上，还体现在作者的创作上。譬如，《西施传》揉碎了《庄子·天运》中东施效仿西施的历史故事，进行了二次创作。原本故意模仿西施心口疼而使人生恶的东施，在这里，成了一个善良、令人欢喜的小姑娘。东施虽然外表丑陋、身材臃肿，但依然有着小女孩般的天真，并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差，她如所有的女子那样，有一颗爱美的心。柳岸作为一位女性作者，在女性视角下，通过独特的想象力和细腻的文笔，塑造了一位外表不完美却有一颗追求美的心的少女，并使其美学追求具有了非同一般的现实意义。

“春秋名姝”系列小说为读者呈现了历史上四位女性的传奇经历，她们的生活内容各不相同，结局也各有所异，但不可否认的是，她们的经历都可称得上是一种“传奇”。当然，由于她们均居于春秋时期的关键时期，并深深地介入到了缠绕的历史之中，所以，她们的生命史也就是另一种春秋的历史。作者并非无意于春秋历史的既有书写，但是，当她将所有的视野都专注于历史中女性的命运历程时，其实是想透过女性个体去寻求“合理地解释这些事件何以发生”的一种可能。从这一点而言，柳岸事实上是在做着一种严谨的工作，那就是开放我们的历史观念，其时代意义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她再现历史，严谨周全”“仅此一点，已使这部书具有重要价值”。